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形成的動態歷程

—對史培金斯所著《了解政治理論》一書的介紹

郭仁孚*

- 一、前言
- 二、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政治混亂失序的危機意識
- 三、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政治問題或病情的診斷
- 四、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重建規範性政治秩序的想像
- 五、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解決政治問題所建議的方案
- 六、結語

本文純為對史培金斯所著《了解政治理論》一書之忠實性而非批判性介紹，介紹的主要內容為史氏審視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形成的動態歷程所用的架構。該架構包括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政治混亂失序的危機意識；第二階段為他們對政治問題或病情的診斷；第三階段為他們重建規範性政治秩序的想像；第四階段為他們解決政治問題所建議的方案。

本文雖然最後曾提及史培金斯本人對其所用架構的價值的自我肯定，但是本文之介紹該架構，主要並非基於此種考慮；而是有鑒於該架構對連接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形成的起點與終點的動態過程所作的分析，在眾多介紹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著作中，與眾不同，獨樹一幟，極富開創性，值得關心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人的密切注意。

關鍵詞：湯瑪士史培金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了解政治的理論架構、理論形成的動態歷程、政治問題、政治失序、政治危機、政治家的危機意識、精神或心理治療、理論家的診斷病情、主觀的客觀化、感情轉移、感情替代、政治秩序、理論家的想像、烏托邦、政治規範、政治行動方案、實然與應然之間關係的爭論、敘述事實與建議行動之間的關係、真實的原則、人類的自然衝動、影響合理政治行動的因素、形成政治類似演電影的比喻、理論家類似偵探的比喻、政治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專任教授

眼光。

一、前 言

筆者曾在東吳政治學報第八期撰寫「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基本認識」一文，分別就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意義，性質與目的作了簡略的說明。本擬緊接著介紹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在結論上的主要內容，但是幾經考慮之後，乃暫時作罷。

一則考慮到坊間有關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之書籍，幾乎全部都是在介紹它在結論上的主要內容；除非確有與眾不同之獨特處，否則實無必要再在這方面畫蛇添足，多此一舉。

再則考慮到說明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意義、性質與目的，並且介紹它在結論上的主要內容，雖為認識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所必需，但仍不足以認清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全貌。如果我們把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形成看成是一種動態的歷程，上述一切只告訴了我們它的起點與終點——它所問的問題及它所給予的答案，但卻沒有告訴我們從起點到終點的中間歷程，因此它們實不足以使我們認清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全程。為了認清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全貌或全程，我們不僅需要知道它所問的重大問題是甚麼，而且還需要知道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如何去解答那些問題；不僅需要知道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目的是甚麼，而且還需要知道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如何去達成那些目標；不僅需要知道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產生了那些結論，還需要知道那些結論從何而來及如何被合理化。

基於上述兩種考慮，目前最值得我們努力以赴者莫過於設法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形成的動態歷程獲得全盤性的了解。當然，想要對不同時代及不同地方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形成其各自理論的心路歷程有一系統性的全面了解，絕非易事，更非筆者個人能力之所及。所幸筆者發現史培金斯(Thomas A. Spragens)的《了解政治理論》(Understanding Political Theory)一書，

在這方面幫了我們莫大的忙，因為這位青年政治學者透過在紐約的聖馬丁出版社（St. Martins Press）於一九七六年出版的這本書，正是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形成的歷程所作的動態分析。此種分析雖然不能說後無來者，至少可說前無古人，值得筆者忠實的詳加介紹。

在史培金斯看來，不管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所用的術語多麼不同，無論他們所表現的格調多麼有異，他們都關心相同的基本問題，而且採取相當一致及一貫的解決問題的模式。由於這種一貫的研究模式通常並未明示在他們已完成的結論裡，因而史氏之研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既不從理論家的結論開始，也不從他們所欲解答的問題開始，而是從刺激他們開始進行研究他們自己的具體關切或迷惑感開始。在史氏看來，一旦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自己的研究開始進行，他們的研究過程便開始具有其自己的動態性質：他們對於原始問題的答案又引起必須面對的新的問題，他們對新問題的答案當然更會產生另一層次的其他新問題，如此不斷的繼續下去，直到他們最後達成對整體的看法為止，刺激他們研究的原始關切才能得到滿足。（p.15）

史培金斯用以審視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形成的動態架構包括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理論家對政治混亂失序的危機意識：幾乎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都從他們對現行的政治混亂失序開始。偶而雖然也有政治理論家安於其所處社會的現狀，刺激他研究的動機只是想探究現行秩序基礎的追求知識的好奇感，但是這畢竟是例外而非原則。原則上大多數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研究工作都起源於他們對所屬社會有一種不對勁的感覺，因此他們最先的關切是去找出問題之所在。有時這種工作很簡單，譬如經濟崩潰或內戰所構成的社會危機，一目了然；但其他時間則非如此，單找出問題就需要理論家仔細的思考。（p.16）

第二階段是理論家對政治問題的診斷：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找出政治問題之後，他們不能就此停止不前，他們必須繼續探究問題的根源，他們必須對他們覺察出的政治功能故障加以仔細的診斷。去發現某特定政治問題後面的動因如何運作，通常是非常困難及微妙的工作，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中

某些最突出的知識上的模式就是爲了達到此目的而設計。（p.16）

第三階段是理論家重建政治秩序的想像：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診斷出政治問題發生的根源之後，他們很自然的便轉向考慮如果政治問題能有效解決，則新的政治世界將呈現甚麼模樣。通常他們必須運用想像力去思想現在尙未存在的新政治秩序。（pp.16—17）

第四階段是理論家解決政治問題的方案：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在找出現行政治體系的功能故障之後，在發現造成此種故障的某些因素之後，在想像出新的政治秩序的面貌之後，他們很可能提出某些建議方案，他們自然會提出他們所認爲最能解決他們所分析的政治問題的政治行動方面的建議。有時理論家的建議非常明白而且直接，有時他們的建議則是間接而且沒有系統。（p.17）

史培金斯的《了解政治理論》一書共分爲六章：第一章爲緒（序）論；第六章爲結論；其餘四章爲全書的主幹，乃針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形成的四個階段分別所作進一步的一一詳細的說明。本文之介紹史氏的《了解政治理論》一書，以“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形成的動態歷程”爲題，不僅蓋括了全書的大部份內容，而且更掌握了全書的精華所在。

二、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政治混亂失序的危機意識

在史培金斯看來，大多數傳統經典政治理論都是爲了應付某些迫切的真實問題而開始。這些問題引起理論家的注意，它們不僅只要求理論家研究它們，更要求他們必須了解造成真正問題與痛苦的危急情勢（p.20）

在史培金斯看來，促成政治理論的危機是以不同的方式出現。它可能是大家顯而易見，波及全社會，影響社會上一切人生活的巨大混亂與災難，內戰或經濟崩潰便是最常見的例子。即使在像這種極端危急的情勢中，史氏提醒我們注意：找出並了解問題的性質，並不如表面上看起來那麼容易，因爲雖然幾乎人人都同意的確甚麼地方有些不對，但是究竟真正發生了甚麼問

題，則議論紛紛，莫衷一是。譬如廣泛的內鬥與流血明顯的指出有問題的存在，但是真正的問題是由於政府的壓迫呢？還是由於政府的軟弱呢？有人認為是由於政府的鎮壓，有人則認為是由於政府的縱容。因此，即使在界定問題之初，複雜的意識上的判斷便早已開始運作（p.26）

其他的危機雖然較屬有限的性質，但或許更為複雜，它們不易為政治體系中的參與者立即發現，某些人也許不相信真有問題的存在，然而史氏卻認為理論上的爭論也許就在此處開始。譬如當馬克斯所看到的問題是英國工人階級的貧窮與痛苦時，其他的人所看到者只不過是在一非完美世界中不可避免法則的必然結果。因此在史氏看來，產生政治理論的危機在某些情況也許不是普遍的，而只是局部的，甚至只是個人的意識。換言之，政治理論家對現行政治體系的基本規則從夢中覺醒的理由，或許不是社會上一切人所顯而易見；能見到它的政治理論家或許屬於社會現行基本假定對之特殊不利的團體，或許他只是對別人不能見到的社會不正義或精神上的崩潰在荒野中獨自吶喊。（pp.26—27）

根據史培金斯的看法，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最後目的雖然在於了解及解釋社會的正當秩序，但是它卻起源於理論家對社會秩序有不當的意識。（p.27）

史氏注意到當我們想了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時候，我們首先所問的一連串問題就是：「他的問題是甚麼？」或他所看到的不當或危險或腐化是甚麼？」或他開始努力研究以便寫出一種深刻及連貫的政治理論的動機是甚麼？或他想治療的特徵或失序是甚麼？我們之所以如此問他，因為他一定是對他自己社會的特殊而且迫切的問題有所反應才開始寫作。史氏在此所強調的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是在他自己的生活中及在他自己的內心世界裡經驗到社會的失序；換言之，問題雖然存在於外面的社會，但是也同時存在於理論家的內心。（p.28）

更進一步言之，史培金斯的意思是：因為社會的危機擾亂了理論家個人內心的平衡，因為理論家個人的心態或精神狀況是和社會角色、社會習俗及行為模式緊密相連，因此社會的動亂很可能造成理論家個人情緒上的強烈混

淆與苦惱；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很可能因此被迫不得不思考政治體系的問題，以便找出他自己內心痛苦的根源所在而予以驅除。譬如盧梭在其《懺悔錄》中告訴我們他個人的痛苦在其政治思想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約翰米彌在其自傳中述說他曾經歷幾乎完全的情緒崩潰。這導至他看見他繼承自父親的理性主義的社會中過去從未懷疑過的缺點。黑格爾個人的「認同危機」也似乎在刺激他的政治理論中扮演過重要的角色。（pp.28—29）

史培金斯在很多方面都把傳統經典政治理論比喻為一種對政治體系的心理或精神治療法，這種比喻特別適用於研究的結構與目的兩方面。和心理或精神治療法一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一開始便企圖發現政治功能嚴重失序的性質及根源。和心理或精神治療法一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使深究人類行為的根源有其必要，因為此一領域沉沒於正常意識之下，久已被視為當然。和心理或精神治療法一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最後目的是要面對痛苦的根源，並且設法戰勝之。（p.29）

史培金斯雖然認為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自己所經歷的特殊問題有所反應，但是並不認為他們的問題只純粹對個人或當地有意義。在史氏看來，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研究的價值或相關性，乃來自他們之深入常出現於政治之中的基本問題。譬如霍布斯在檢視十七世紀英國的內亂問題時，曾深入至人類不同的慾望調和成一穩定社會的基本及持久的問題。盧梭在檢視十八世紀法國的腐化時，也曾檢視一切人類社會在道德上的要件。馬基維尼在探究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的混亂失序時，曾提出了關於政治權威的性質及範圍的普遍問題。總之，史氏所強調的要點是：任何偉大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均超越其周圍環境的限制，雖然他自己個人所屬的政治情勢提出並且界定他所遭遇的問題，但是它所表現及反映者實與任何時代與任何地方的人類秩序問題均有關連。換言之，傳統經典政治理論雖然從特殊的歷史困境開始，但是其價值則在於其結束時觸及永恆的問題。（pp.29—30）

在史培金斯的心目中，某些最偉大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寫作，乃是對內部秩序的瓦解或有瓦解的危險所作的反應；他們寫作的時間與地點正是

政治墮入戰爭之際，這種急迫的危險迫使馬基維尼、霍布斯、貝克及洛克等政治理論家均探討甚麼使社會團結一致？人類何以及如何能使其政治歧見與衝突不致瓦解社會？這是實際上最基本的政治問題，也是涉及人性及社會地位的最基本問題。（p.30）

史培金斯特別舉出一些實例，以詳細說明某些特定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和他們所遭遇的特殊歷史危機之間的密切關係。史氏所列舉的實例包括：馬基維尼和安定的危機（pp.30—31），霍布斯和權威的危機（pp.31—33），洛克和正當的危機（pp.33—34），法國自由哲學和古老政權的危機（pp.35—36），貝克和謙恭的危機（pp.36—37），馬克斯和資本主義的危機（pp.37—38），盧梭和道德平等的危機（pp.39—40），以及柏拉圖和雅典正義的危機（pp.40—44）等。本文限於篇幅，不能在此一一分別詳加敘述。

三、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政治問題或病情的診斷

在史培金斯看來，一位為對政治混亂失序的危機意識所困擾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不可避免的會很自然的繼續進一步研究下去。對「此處有甚麼不對勁」的第一個問題的答案的本身，又有其自己的謎惑而成為更多問題的胚芽。此時理論家開始研究的熱忱仍然存在，因為在此階段對他所感覺的混亂失序還沒有補救的辦法；基本問題只是找出來了，但是還沒有加以解決。只對「不對勁」有所感覺並不提供實際的指導，促使理論家開始思考的對現實的動盪不安感尚未被驅散，他因此必須繼續研究下去，以便發現他必須如何做才能脫離困境。此時他求知的研究衝動仍然存在，當他感覺到混亂失序的事物時，感覺的邏輯要求這種感覺的背景必須補入。於是有兩個特別的問題立即會出：第一，如果政治情勢混亂失序，它為甚麼會變成這種狀態？第二，如果政治情勢混亂失序，則健全秩序的政治體系將是怎樣？（p.46）史培金斯以後將討論第二個問題，此處他只討論第一個問題。

史培金斯把找出政治功能故障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處境，看成和找

出疾病症狀的醫生的處境相同：兩者都不能在那裡停止下來，因為找出症狀還不夠，病情必須向後追溯至發病的病根，因此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和醫生一樣的面臨診斷的工作（p.47）在這個階段，政治理論家變成因素分析家，他所面對的工作是在非常複雜的世界中，找出因果關係的非常重要而又難以處理的工作。那種工作非常重要，因為除非他能找出他所感覺到問題的原因，他並不真正了解那個問題；如果他不了解那個問題，他又怎能對解決那個問題提出健全的建議呢！那種工作非常難以處理。因為它是一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中最具關鍵性而又非常難以回答的第一個問題，政治思想就是因為這個高難度的第一個問題才分成重要的派別。（p.47）

在史培金斯看來，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診斷工作中最重大的第一個問題是：爭論中的政治問題是否有政治的根源？換言之，問題的原因及徵兆是否具有真正的政治性質？史氏把這個大問題又分成兩個較小的問題。由於政治因素是一般而非個別的因素，是人為而非自然的因素，因此政治理論家必須發現：究竟他所感覺到的問題是在社會層次發生因而是一般性的問題，或者只是其個人在性格上的苦惱因而只是個別性的問題。如果他確定它是一般性的社會問題，他必須更進一步確定究竟它是可以變更的人為安排的協定，還是不可變更的自然的既定。（pp.47—48）

史培金斯分別就這兩個問題作了更進一步的說明。

首先就確定問題的根源是否政治性所引起的第一個問題而言，問題究竟是一般的社會問題或只是獨特的個人問題？究竟是體系出了問題或是個人出了問題？問題的根源在於社會的政治安排或出於個人的神經？就史培金斯而言，這當然不是容易判斷的問題，它絕不是確定一個人類生活中的問題是自己或社會的問題那麼簡單的事，因為自己及社會都可以說是自我：社會是很多自我之間的系統關係，個別的自我則從社會互動關係中產生。要想知道兩者何處開始，何處結束；或要想知道一種崩潰源於自己或社會，實非易事。一方面，表面上所顯現的雖是個人的精神崩潰，其實很可能是扭曲而失去人性的社會模式的結果。另一方面，明顯是從一個人或一群人心裡所產生

的心態問題，卻把它們錯怪在社會身上，這就是心理學家所謂的「主觀的客觀化」。（pp.48—49）

在史培金斯看來，心理上的問題同樣也會經由「感情轉移」及「感情替代」作用而侵入政治之中。當一個人感覺另一個他並不真正認識的人好像就是他所認識的別人時，感情轉移作用便發生。通常當一個人把他對父親的感覺轉移至第三者（如心理醫生、老師或牧師）而視如父親時，便發生感情移轉作用。換言之，某些具有權威的人被感覺成好像是一個生活中作為原始權威的父親一樣。政治權威特別是如此，對幾乎一切有政治權威的人物所顯示的過度尊敬或過度敵視，一部份是由轉移感情的心理作用而來。在感情替代作用中，個人轉移其感覺及行動的方式同樣能產生政治的後果。譬如一個被嘮叨不休的老婆或吹毛求疵的老板所激怒的人，常會用侵犯他人的行為方式發洩累積在他心裡的仇恨。這種心理上的代替作用雖然能幫助個人洩憤，但是當社會上特殊團體或別的國家變成這種仇恨發洩的對象時，它就會變成政治問題，於是從心裡發出的力量便會產生戰爭或種族糾紛，或至少加速其發生。（p.50）

由上述史培金斯的看法可知，自己和社會是在複雜的多邊方式中糾纏在一齊：社會的混亂能造成心理的瘋狂，心理的失常也能造成社會的失序；兩者之間孰為因，孰為果，很難確定。但是無論多麼困難，史氏仍認為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在其診斷過程中，必須面對這些非常棘手的因果關係問題作出某種判斷。他們在這個研究階段所得出的答案，對他們的整個理論具有決定性的影響。他們的首要工作是確定他們所感覺的問題的根源，不僅只是個人的，而且更是政治的。他們必須確定他們所感覺到的政治混亂失序，不僅只是他們自己心理上的主觀客觀化，或者感情的移轉，或者感情的替代。（pp.50—51）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政治分析中，史氏發現重大的歧見就是在這裡發展出來。譬如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斯及塔克爾等人關於「疏離」在診斷上便存有重大的歧見。（pp.51—52.）

另一個部份重疊但平行的診斷問題就是上面史培金斯所提到的第二個

問題：混亂失序的來源究竟是自然的，還是人爲的？失序問題究竟是出自人類必須調適的既定而不可避免的心界某些特徵，還是出自人類所創造因而能加以適當改變的世界某些方面？人類社會的不幸的原因究竟是根源於事物之本性，還是根源於人類所能控制的環境的某些部份？（p.53）

在史培金斯看來，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中比較保守者，會把人類的「不幸」看成來自自然的原因而非政治的失敗。或者反過來說，凡是把人類不幸的主要來源看成是自然的政治理論家，其政治觀會比將人類不幸的主要來源視為社會的政治理論家的政治觀更為保守。史氏認為這種關係甚合邏輯，因為如果人之受難主要由於超越人類控制的力量，則期望政治能使他幸福是不合理；但是如果人之遭殃主要由於錯誤的政治安排，則政治行動便成為尋求救濟的適當場所了。換言之，保守的診斷者相信人類是因為很多理由而受苦，而大多數的苦難是不易用政治方法使其和緩的。（pp.54—55）

另一方面，史培金斯認為激進的診斷者則將控訴指向「體系」，將「個人問題」的責任誘過於社會因素，並將個人與社會在分析上的區分降至最小。換言之，在激進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看來，心理上的徵兆可以被視為基本上政治混亂失序的表現，心理問題因此轉變為政治問題，私人的混亂失序是整個社會混亂失序的直接反映，對前者的治療有賴於對後者的治療。根據這種看法，如果一般人民沒有感覺到他們的問題的原因基本上是政治性的，這種無知所代表的則是被體系洗腦成功的意識上的失敗。在這種看法中的宗教成為人民認知及情緒上的鴉片煙，它對人類的困境提供錯誤及誤導的分析。史氏認為激進政治理論家的這種診斷，在較保守的政治理論家的心目中，不僅微不足道，而且有誤導作用。在他們看來，把個人的煩惱怪罪於社會，在知識上及道德上都有錯：它在知識上是錯誤的，因為這種看法對人類心靈所提供的說明既膚淺又錯誤；它在道德上也是錯誤的，因為它利用社會作為替自己的軟弱免責的藉口。（pp.55—56）

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之間的某些爭論就是圍繞在診斷爭論上打轉，其中大多數是關於人性診斷的爭論，也有些是關於對制度診斷的爭論。史培金斯

特別從中挑選了一些最著名的爭論，作為詳細探討的例證。史氏所挑選的爭論包括：貝克和潘恩之間對社會低層的無知問題診斷的爭論（pp.56—57）；奧古斯丁、路德、霍布斯及佛洛德等悲觀份子和亞里斯多德、盧梭及胡羅門等樂觀份子之間關於人類侵略行為診斷的爭論（pp.58—66）；以及馬克斯、柏拉圖、洛克和盧梭等人對政治體系運作失敗診斷的爭論（pp.69—70）等。本文由於篇幅有限，不能分別對這些重要的例證一一加以介紹。

四、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重建規範性政治秩序的想像

在史培金斯看來，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政治失序的意識，除了引起診斷的問題外，還引起正當秩序的問題，因為當他經驗到某種政治情勢失序時，此種經驗會向他暗示必有另一種政治情勢不會失序。換言之，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此時必須面對的默示問題是：如果這是不當的，那麼甚麼才是正當的？如果這是疾病，那麼甚麼才是健康？總之，他必須面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中心問題：甚麼是良好的社會？他必須確定正當或良好政治秩序的性質。當他進行此項工作時，他必須將正當或良好政治秩序和他所診斷的不當或不良政治秩序（混亂失序者）加以對照比較：如果他所診斷的舊政治失序是疏離性的，非理性的，腐化的或壓迫性的；他必須找出甚麼是非疏離性的，理性的，清廉的或非壓迫性的新政治秩序。（pp.77—78）

史培金斯認為舊的政治失序不僅刺激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思考問題，也提供他解決問題的線索：即如何去改造舊的政治失序，並以與它相反的新的政治秩序代替之。史氏特別強調這種改造或重建的工作，不是實際政治上政治家的改革工作，而是政治理論上理論家的想像工作。換言之，理論家在思考如何改造舊政治失序或重建新政治秩序時，他必須依靠他的想像力；他必須先觀察現行政治如何失序，然後再想像未來的政治秩序像什麼樣子。（pp.78）

在史培金斯的心目中，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未來政治秩序想像的結果

就是他們對政治秩序的想法或看法（Vision），這種想法就是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中的烏托邦成份。「烏托邦（utopia）」一詞源自希臘文「（no place）」之意。此意從古至今，一直適用於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未來政治秩序的想法。換言之，此種想法除了存於理論家心中之外，不存於任何其他各處；它的「存在」只是一種可能，它或許代表未來，它或許只是天上的理想，但是它並不存在於此時此地。（p.79）

因為「烏托邦」一詞常被人誤解為不切實際的幻想，史培金斯不遺餘力的特別對之加以澄清。根據他的澄清，當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運用他的想像力在心中重建未來的理想政治秩序時，他絕不能任意盡情的胡思亂想，他對理想政治秩序的想法雖屬想像，但是必須與真象密切相連；換言之，它必須潛存於人類實際生活之中而真有實現的可能，否則它就純屬幻想。更進一步言之，當理論家用想像力重建未來理想的政治秩序時，他所要企圖達到的是一種關於世界，政治及人的全盤真理：這種真理當然不是狹意的「經驗性」真理，不是對此時此地已經發生的政治現象的靜態及封閉式的說明；而是對實現政治潛能有所作為的動態及開放式的期望。（pp.79—80）

史培金斯非常重視烏托邦的功能：人類如果沒有烏托邦式的想像，則人類生活必然停滯不前，沒有進步；如果沒有烏托邦的指引，則現在不僅不能前進至未來，反會退步至過去，這種現在無異於死亡，因而充滿活力的現在只能活在未來與過去的緊張關係中。在史培金斯看來，理論家重建可能的理想政治秩序的想法，雖然是針對未來，其實也有益於對現在的改善，因為只有把現在的事務和未來可能的理想對照比較，我們才能看出現狀的限度與缺失，才不會自滿於現狀而不思有所改良。（p.80）

在史培金斯看來，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賴以重建理想政治秩序的正當秩序標準，就是政治生活中的「規範（Norms）」；作為標準的規範則是一種模型式範式，這種規範模式的功用就是提供政治理論家判斷現行政治體系是否適當的標準。史氏認為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中，政治的規範模式是用不同的語言及概念加以表達：「良好」與「正當」是最常見也最模糊的用語；其

他諸如「正義」，「健全」或「健康」，雖然較為特殊，但是仍然難以捉摸；此外，像「成熟」或「功能上完整」等術語，有時也用來作為規範。總之，在史氏心目中，規範性概念是用來直接或間接象徵相反於有缺陷的失序的完整的有秩序的狀態。（p.82）

史培金斯特別強調規範絕不是理論家個人偏好的任意表達，而是他們發明與發現的結合。就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所重建的規範性政治秩序而言，史氏認為這是他們的發明，因為它們需要政治理論家創造性的努力，他們所提出的規範性政治秩序不能只靠觀察而得到，因為它們不是已存在的歷史現象，他們必須從事一種「思想嚐試」：即在他們心中想盡辦法把實現人類政治潛能的政治秩序的形象想出來。在這一點上史氏認為政治理論家無異於藝術家：他們的良好社會的規範性模型是一種人生戲劇的劇本，它們替政治作品提供情節與角色。（p.83）

此外在史培金斯看來，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所重建的規範性政治秩序同時也是他們真正的發現：它們不只是他們所創造的，也是他們所發現的。史氏認為他們事實上用以發現的社會的方法，有些類似科學家發現新理論的方法：他們應用政治事實作為線索，以引導他們認識使這些事實具有意義的模式；正如科學家對新理論的發現來得好像意外的啓發，政治理論家發現黎明的光輝突然使他們看見景色。此外，史氏認為政治理論重建政治秩序的研究是一種發現，更因為它們受到客觀真象的約束：他們之敘述良好的社會，不是他們個人主觀的幻想；他們對政治生活的規範模式的精心推敲，是他們對真實世界中真人潛能的詳細敘述。（pp.83—84）

總而言之，在史氏看來，由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所重建的良好政治秩序，一半是藝術，一半是科學。它們一部份是創造性發明的作品，一部份是有規律發現的結果。它們需要想像，但是這種想像根源於具體的經驗中；它們旨在追求真理，但是這種真理超越對現狀的靜態敘述。（p.84）

史培金斯把理論上重建規範性政治秩序的研究途徑分成三類：第一類是激進性的研究途徑（pp.86—87），第二類是保守性的研究途徑（pp.87—88），

第三類是介於兩者之間或與兩者重疊的務實性研究途徑（pp.88—89）。史氏在分別說明三者各自的性質與優劣之後，隨即從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中挑出幾個例子，但是他並不是用這幾個例子來進一步從史實說明前述理論上政治理論家重建規範性政治秩序三種研究途徑的分類，而是用它們來進一步強調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重建良好的政治秩序和感覺與診斷不良的政治失序之間的相反關係的基本模式與此模式大同之中的小異。

在史培金斯看來，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良好社會的想法，是建立在他們對社會混亂失序的性質及根源加以診斷所得的結論上。換言之，他們在理論上所重建的政治社會，乃是他們在實際上所經驗到的病態社會的健康版本。（pp.89、3）史氏以柏拉圖在共和國中所重建的正義社會為基準出發（pp.89—91），然後用美國制憲之父在聯邦主義論文中所重建的有秩序的自由與之比較，並探討兩者之間的異同（pp.91—93），隨後在同一模式中更比較霍布斯在巨靈中所重建的安全社會和盧梭在社會契約中所重建的道德社區（pp.93—95），最後則以馬克斯在革命之後重建的獨特共產社會作為對前述基本模式的扭曲（pp.96—98）。本文由於篇幅有限，不能對史氏所精選的上述實例一一加以說明。

五、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解決政治問題所建議的方案

在史培金斯看來，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在找出政治問題的根源之後，在想出新政治秩序的面貌之後，他們緊接著下一步須做的就是提出能除舊佈新的政治行動方案。史氏在這一方面所談的不是行動方案的內容，而是如何才能達到目的之合理的政治行動方案的性質。他之所以會如此，大概是因為行動方案的性質問題遠比其實質內容問題複雜得多，所以才只談如何澄清其具有爭議性的性質，完全沒有有系統的說明其具體的實質內容。

關於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建議解決政治問題的政治行動方案的性質問題，此問題涉及現代哲學家在邏輯上嚴格區分實然與應然而引起的不斷爭

議。自休謨（David Hume）以來直至當代的實證主義者，都一致主張「應如何做」的指示不能從「就是這樣」的事實的前提推論出來。史培金斯對這種主張頗不以爲然，在他看來，休謨所觀察到的我們不能從實然得出應然，從狹意的邏輯來說，雖屬原則而非例外；但如果就此論定如此而不斷繼續討論下去，實會產生嚴重的誤導作用；因爲實然和應然之間的斷裂，使我們日常生活中一項最常見的事實變成神秘起來，此事實即關於世界是如何的看法對人之所爲有深刻的影響。（pp.102—103）

史氏強調我們大家都是用我們對真象的了解來指導我們的行動，我們大家對何以做某事的立即反應是指出關於世界的事實；我們都期望別人給我們理由以解釋他們爲甚麼要命令我們做某些事，那些理由都依靠事實。因此在史氏看來，根據生活事實所作的敘述，能給予任何命令以力量與意義；沒有事實的根據，命令變成空洞與不合理；在我們生活的真實世界裡，規範性的建議需要事實的根據，甚至最簡單的事實陳述也具有指示的影子。（p.103）

總之，在史培金斯看來，對事實的陳述帶有寬鬆意義的指示的含意，因爲它確定適宜與適當的反應的界限；一種敘述愈深刻與愈廣泛，則它所產生的「指示的含意」便愈深切及愈具強制性。史氏認爲一種對世界廣泛的看法，不會用命令、要求及訓誡等命令式句子來表達，但是這種看法對相信它爲真理的正常人的行爲有極大的影響。史氏認爲這正是對政治秩序具有深廣看法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如何具有重要規範性結果的情形；它透過形成我們對政治世界是甚麼的看法，不可避免的也形成我們的行動；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指示」部份是對以特殊方式組成的世界作適當、穩健與合理的反應的推論；一種對真象的廣泛的看法，其本身並不在邏輯上產生確定的指示，但是它顯然對「合理的」行爲有劇烈的限制。（pp.103—104）

在「實然」與「應然」之間，在對世界的敘述和對行動的指示之間，神秘失蹤的連接物，在史培金斯看來，其實並未失蹤，也不神秘：把兩者連接在一齊的，一是真實的原則，另一是人類自然的衝動。真實原則只命令我們「現實的」的行爲，它建議我們把我們的行動建立在對真實而非想像的世界

的明示感覺之中，為真實原則所支配的行動必須把夢想及幻想和真象及可能分開。人類自然衝動的力量就是人的「正常」行為模式的結果：邏輯上人類會尋求混亂、痛苦、專制及自我毀滅；但是通常人類會設法避免這些危險，而尋求秩序、幸福、自由及實現。因此，如果你對某人說這條路通往實現，那條路通往毀滅，你並沒有作嚴格意義的指示—你並沒有指示他應走這條路而不走那條路；不過如果他相信你的話，他一定會走這條路而不走那條路，因為如果他是一個正常而又頭腦清楚的人，他當然寧願實現而不願毀滅，因而應走這條路而不應走那條路。因此在史培金斯看來：人類正常的性向既是如此，政治理論家就沒有必要說指示性的話以達到指示的效果；換言之，他沒有必要用命令式的措詞以便其讀者從他的政治觀中作指示的推論，他只需告訴事實即可，其讀者的自然傾向會做其餘的事。（pp.104—105）

史培金斯認為實然和應然之間的差距會大為縮短：因為一方面應然永遠不會是完全任意的，具有正常動機及同情心的人會感到有義務必須對某種真象作某種方式的反應；另一方面實然也不是非常的明顯和簡單，對政治秩序完全的看法是不能用證據去加以證實的，它們常常需要判斷—確定某種簡單及孤立的政治事實或許不難，但要完全知道政治是怎麼回事則非常的困難。在史培金斯看來。對特別是政治真象的完全而又充分的描畫或寫照，必須包括對其潛能、可能、必然及真實四方面的評估；每一方面都對合理的政治行動有重大的影響，每一方面都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雖然證據可用來支持關於每一方面的特別主張，但是每一方面都不容易為簡單的證據所支配。（pp.107—108）

在史培金斯看來，對甚麼是可能，甚麼是必然，甚麼是真實的困難的判斷，顯然會對理論家建議的方案有所影響。史氏認為在傳統經典政治理論中，大多數最著名及最重要的關於政策建議的爭論，都是要靠這種困難的「事實上」的決定而定。（p.109）他分別從人類潛能的界限（pp.109—110）、政治上可能的限度（pp.110—112），必然所加予的限制（pp.112—118）、及真象和幻覺在人類事務上之難以截然區分（pp.119—122）等四方面，詳細

評估它們對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對解決政治問題所建議的方案在品質上有任何不同的影響。本文由於篇幅有限，不能一一介紹史氏在這四方面的評估。

六、結 語

史培金斯的《了解政治理論》一書替我們提供了了解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一種架構，此架構的焦點集中於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進行研究的過程，此過程實即他們心靈中從事思考的理論活動過程。史氏把其了解政治理論的架構自喻為一場電影：和電影一樣，它有情節及動作，有開始的問題及高潮；在刺激動機的衝動和劇情的結局之間，還有一連串非常詭異微妙的偵查工作。（p.130）

在史培金斯的心目中，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的思維程序正如偵探的偵查過程一樣，雖然偵探的問題只是犯罪的個案，政治理論家的問題則是整個社會的失序。從社會失序開始，政治理論家和偵探一樣，必須尋找其線索，發展其預測，找出他所經歷的問題的深刻性質及該問題常潛藏的根源。最後政治理論家和偵探一樣，也會結案；他確定他所相信導致社會失序的基本原因。政治理論家的發現和偵探一樣，永不會真正的中立：他嚐試完全的「客觀」，其意義是指他所談的問題的真正根源及對問題合理的反應而言；不過他的診斷幾乎不可避免的將有助於視某一種行動為正當的謹慎，另一種行動則為不合格的不健全。（pp.130—132）

史培金斯自己認為他所提供關於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程序的電影模式具有兩大優點。第一大優點是它有助於將政治理論的永久性問題置於其應處的脈絡中：無論何時及何處，只要人類試圖深刻了解其政治困境的性質時，某些最基本的問題便會出現。譬如：人類的自然欲望是甚麼？社會如何才能具有秩序以避免崩潰因而陷入內戰？自由與安定如何才能調和？我們能期望政治對人類福祉貢獻多少？只要我們能了解政治理論的動態，我們便能了解這些問題在何處發生及何以會發生，並能了解它們朝向何處一何以答案是重

要的。(pp.132—133)

史氏自認其關於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的電影模式的第二大優點是它有助於強調政治研究之深具人性：政治理論乃從生存的形勢而非從抽象的「觀察」而達成，換言之，它是由深切及熱烈捲入其題材的人所產生。由於作為其檢視的政治秩序的成員及產物，政治理論家因而既是「主體」，也是「客體」，他的分析經常一部份是自我的分析。因此政治理論就此意義而言乃是自白的：政治理論家在陳述其政治理論時，同時也在陳述其本身的身份，即確認他自己作為政治動物的存在意義。由於政治理論乃是由應付政治問題的實際工作中所產生的關於政治的感覺與思想，因此政治理論的創造不是由前提移向結論，而是由問題移向解決；其內在的動能不是來自抽象邏輯的強制，而是來自處理人類政治情況的有思想的人的衝動。(p.133)

對於想了解政治理論的人而言，史培金斯認為他所提供的上述架構更具有三種功用。第一，它能幫助讀者了解如柏拉圖、霍布斯或盧梭等個別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有了此一架構之後，讀者應能不難了解政治理論家的動機和目的。讀者尤其應更能了解理論家研究的「邏輯」—認知其思維程序的成份，並且理解它們之間的關係。讀者應能看見的不僅是理論家所說的是甚麼，而且更是他為甚麼那樣說。如果在一特殊理論中遺漏甚麼，以致該理論因而殘缺不全，讀者應能知道如何去找出遺漏的部份。(p.134)

史氏認為其架構的第二種功用是：以如此方式了解政治理論的動態歷程，愈有助於讀者比較不同的政治理論家。由於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是從不同的傳統及在不同的社會環境發言，因此沒有兩位政治理論家能以一對一的簡單方式直接加以比較。不過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史可說是偉大的政治理論家彼此之間對談的一種對話，如果他們所面對的困境永不會完全相同，但是至少它們具有重疊的部份，足以構成他們一致面臨的有意義的「共同問題」。不同的政治理論家在面臨這些類似問題時，經常會達成紛歧的不同結論，以致我們可以區別如「霍布斯式」及「盧梭式」的不同看法。這樣一來，讀者便找出歧見的主要領域，並能看見它們後面的理由及論點。(p.134)

史氏認為其架構的第三種功用是：它能幫助讀者達成其自己的政治看法。使他們能挖出他們自己的「無言的意識形態」因而看見它像甚麼。換言之，該架構能使讀者找出某些形成其自己的政治身份及自己的政治行動的重要政治信仰，使他們能找出藏於這些信仰後面的基本判斷，並把它們交付批判性的仔細審查。總之，它能刺激讀者意識到某些太輕易被視為當然的觀念。（pp.134—135）

在史培金斯看來，最後形式的傳統經典政治理論等於是一種觀察的方式。由於觀察者自己是他所觀察的政治的一部份，而不純粹是超然的觀察者，因此觀察方式會變成存在的形式，對政治不同的看法會產生不同的政治行動模式（p.138）。在將傳統經典政治理論解剖而觀看其動態成份一對失序的危機意識、對病情的診斷、對重建秩序的想像，及對解決問題方案的建議一之後，史培金斯建議讀者最後還需要透過理論家的眼睛去看政治，而不只是看理論家的思想歷程。換言之，了解政治理論固然要求讀者必須認識其邏輯，必須認識理論家研究的不同階段及每一階段與其他階段之間如何相連；而一旦讀者完成這些工作之後，他們更必須從分析理論家的思想轉移至以想像的方式參與理論家觀察及經驗世界的方式，因為理論家希望其讀者依照他所相信正當的方式去看世界。（p.138）

最後，在史培金斯看來，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寫作的目的不僅在於提供讀者政治的知識，而且也在於改變讀者對政治的看法，以便讀者能更有智慧的去從事政治事務；因為史氏認為傳統經典政治理論家所提供的知識具有治療的意圖，他們開明的政治看法的果實就是實踐的智慧，而具有實踐智慧的人不僅能夠認識政治的真象，而且知道如何採取行動以建立良好及正義的社會。（p.138）

史培金斯的《了解政治理論》一書的真正價值，是否一如原作者本人所說，或更過之而無不及；由於本文之介紹該書純屬忠實性而非批判性，故本文在此不予置評，全交由讀者自己去評斷。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o Spragens' Understanding of Political Theory

Ren-Few Kuo

This research note is an attempt to introduce faithfully, not critically, a book by the name of Understanding Political Theory written by Thomas A. Spragens, Jr. The main content of this introduction is the framework by which Spragens examines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Spragens' dynamic framework includes four stages. Its first stage is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ists' perception of the crisis in current political disorder. Its second stage is his diagnosis of the symptoms and the causes of the political problem or disease. Its third stage is his imagination of reconstructing a new normative political order. Its fourth stage is his prescriptive recommendation for solving political problems.

Although this research note mentions what Spragens himself regards as the virtues and uses of his framework, it introduces the framework not primarily for this sake, but for the sake of its connection of the starting point and the final point of the dynamic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Spragens' analysis in this respect is uniquely creative among all interpretations of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and therefore, is worthy of close attention of those who are concerned with that kind of theory.

Keywords: Thomas A. Spragens, Traditional and classical Political Theory, A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Politics, A Dynamic Process of

Theory-formation, Political Problem, Political Disorder, Political Crisis, Theorist's Perception of crisis, Psychological Therapy, Theorist's Diagnosis, Psychological Projection, Psychological Transference, Psychological Displacement, Political order, Theorist's Imagination, Utopia, Political Norm, Presumption for Political Action, Controversy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 and Ough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scribing Fact and Prescribing Action, the Reality Principle, the Force of Natural Human Impulse, Factors Affecting Rational Political Action, The Analogy of Theory-Formation to Moving Picture, The Analogy of Theorist to Detective, Political Vision.